

# “慢就业”群体就业政策认知及行为响应的研究

## ——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高校毕业生为例

文 / 叶紫琪 刘佳宁 何闻定 黄梓薇

**摘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更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政府尽管出台了众多政策促就业，但与日益凸显的“慢就业”群体形成鲜明对比。文章基于这一矛盾，归纳“慢就业”群体的政策认知情况，从而分析“慢就业”状态形成的约束性因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约束性因素影响行为响应的中介路径。研究发现，政策认知对行为响应的影响路径系数为 0.23，提高“慢就业”毕业生对就业政策认知程度对改善其“慢就业”状态有正向作用。基于此，针对性地提出增强“慢就业”状态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认知程度的合理补充与建议，能够引导毕业生改变“慢就业”状态，创造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慢就业”群体；高校毕业生；政策认知；行为响应

### 一、问题缘起及研究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是发展之基。就业问题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 2018 年曾提出“六稳”方针，其中“稳就业”始终位居第一。在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一词也被频频提及，在 2023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次数高达 28 次，强调“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将青年就业视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全球经济下行、部分留学生归国、毕业生和岗位需求结构性矛盾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严峻复杂，就业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数据显示，2023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 1158 万人，数量庞大，就业形势充满变数。针对新形势下的毕业生就业环境，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在顶层设计方面紧密围绕稳就业工作大局，出台多项促进就业政策。然而，就业问题日益凸显，部分毕业生选择了“缓就业”“慢就业”，且这种现象有逐渐蔓延的趋势<sup>[1, 2]</sup>。这种“慢就业”现象与政府政策的“急帮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社会发展、家庭幸福、个人成长都带来负面影响。当前，高校毕业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躺平”现象，在高校就业实务工作中具体表现为如下两方面：一方面，受国内外经济下行趋势影响，社会供给岗位同比降低，毕业生人数每年剧增，而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毕业生以观望为主，就业行动迟缓；另一方面，各大高校投入大量资源，积极举办多场线上线下招聘会，但据统计，毕业生的求职表现并不积极。

从时间纵向来看，后疫情时代与以往的任何时期相比

都具有其特殊性，在就业岗位整体紧缺的情况下，“快就业”“抢就业”现象并未出现，却呈现“躺平”“慢就业”新特征，这进一步凸显了本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sup>[3]</sup>。从横向对比来看，之前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各项事业发展稳定，基于本土化的思考，如何扭转“慢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解决就业这一最大的民生问题，也凸显出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研究根据“慢就业”状态下高校毕业生毕业后去向对“慢就业”进行分类，主要归为四大类：“二战”考研、考公型；求职待业型；灵活就业型；旅游、修整型。其中，“二战”考研、考公型是指高校毕业生考研、考公失败后仍然继续备考的情况；求职待业型是指高校毕业生还处于求职状态、未就业的状态；灵活就业型是指高校毕业生处于拟创业或者属于自由职业这类就业状态不稳定的情况；旅游、修整型是指高校毕业生毕业后不立即就业，而是选择出国旅游开拓眼界或在家调整状态的情况。

为了研究约束性条件对政策的认知程度的影响，有必要对就业政策进行梳理分类。目前的就业政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就业渠道多样化。从小微民营企业到各大国企，从一线基层到科研国防，都在不同程度地拓宽对应届毕业生的吸纳。二是就业创业帮扶精准化。各大高校响应教育局号召下积极举办的各种创新创业大赛，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创业培训、咨询辅导、成果转化、跟踪扶持等“一站式”服务。三是就业招聘大数据化。高校运用移动互联新技术搭建灵活多样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将毕业生求职意愿信息数据库与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接，根据需求推送岗位、

政策、服务等信息，促进供需精准匹配。

基于此，本研究将聚焦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研究该地区重点高校毕业生中“慢就业”群体的就业心态，对其进行分类；探究该群体对就业政策的认知程度，分析影响该群体对就业政策的认知程度和行为响应的约束性因素。针对不同“慢就业”群体的不同状态，提出提高其政策认知程度的合理建议，以期减少“慢就业”群体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

## 二、研究方法

研究运用 NVIVO 12，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编码，贴出标签 41 个，即 41 个现象，将细分后的 41 个现象进行概念化，经过比较、提炼，最终界定出 46 个相关概念，分析得出 16 个范畴。通过主轴性编码，将 16 个范畴归纳概括为 5 个主范畴，分别为：自我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政策因素。通过对范畴的分析，发现可以将 5 个主范畴凝练成为 1 个核心范畴，即“‘慢就业’的约束性因素”的核心范畴，构建出本研究的分析模型。

### （一）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为研究约束性因素是否影响毕业生“慢就业”状态，以及政策认知是否在其中承担中介变量，使约束性因素影响毕业生“慢就业”状态，本研究共涉及 7 个潜变量并制定测量问卷作为观测指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sup>[4]</sup>。

高校毕业生处于社会大环境和学校、家庭小环境中，毕业生的就业心态容易受到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在外部环境中，政府助业政策、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前景等与毕业生就业状态有较大影响；在内部环境中，自我状态、家庭经济情况、家庭观念、学校技能等也会对毕业生就业状态有较大影响。通过对 5 个潜变量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提出假设并进行交叉验证。

### （二）问卷样本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本研究群体的特殊性，本研究通过 Credamo 见数平台发放问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被调查者的身份属性和问卷的信效度。本次调查共发放 275 份问卷，其中，剔除无效问卷共 69 份，有效问卷 206 份，有效率 74.91%。

从所属地区来看，处于内地九市的“慢就业”状态的毕业生大多位于深圳、广州和东莞三个城市。其中，位于深圳市的毕业生占 27.18%，位于广州市的毕业生占 23.3%，位于东莞市的毕业生占 17.48%。可见，处于“慢就业”状态的毕业生大多位于经济较为发达、就业机会多、人才需求大的中心城市<sup>[5]</sup>。

从毕业院校来看，毕业于“985 工程”院校的毕业生占 16.5%，毕业于“211 工程”院校的毕业生占 24.76%，毕业

于其他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占 44.17%，毕业于专科院校的毕业生占 14.56%。可见，大多数处于“慢就业”状态的毕业生来自普通本科院校。

从毕业去向来看，毕业以后选择灵活就业的占 43.2%，未就业的占 13.11%，打算继续参加（考研 / 考公）考试的占 12.62%，选择在家休整 / 外出旅行的占 2.43%，选择“其他”的占 28.64%。可见，“慢就业”群体毕业生大多数选择灵活就业。

统计可见，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加入“慢就业”群体，且这类毕业生毕业后大多选择在经济较为发达、就业前景较好的城市发展，他们对未来个人经济收入、生活状况等有所憧憬。他们大多数处于就业不稳定的状况，同时较多人选择“二战”考研或考公等，总体表现出对未来发展去向感到不确定性较大的状态。

为测量样本回答结果是否具有可靠性，即受访对象是否真实作答量表题项，通过对样本数据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中总量表和各个潜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在 0.88 上下，表明问卷信度较好，数据结果可靠。

## 三、“慢就业”群体政策认知及行为响应特点

本文以高校毕业生中“慢就业”群体的政策认知为切入点，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高校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在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后，结合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政策行为认知机制，建构了“约束性因素——政策认知——行为响应”的政策传导路径，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将自我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政策因素作为约束性因素，研究毕业生对各项就业政策的认知程度及行为响应情况。

从整体上看，政策认知会对“慢就业”群体的行为响应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相同条件背景下，增强“慢就业”群体的政策认知程度对其改变“慢就业”状态有促进作用。

在约束性因素方面，家庭情况与自我因素之间在就业状态上有强烈的相关影响，部分家庭能够为毕业生“慢就业”提供一定的条件支持。学校因素和政策因素对毕业生“慢就业”的影响则更为显著，毕业生长期处于学校环境中，学校管理制度与就业指导工作开展情况对学生毕业后去向影响较大；鉴于大湾区内地九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各地在具体政策上对大学生就业的支持力度存在不同，政策因素的影响也较为强烈。

##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高校应完善生涯指导“三全育人”模式，提升学生的主观认知水平

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应针对性、专业化地贯彻“三全育人”理念，使学生明晰未来发展方向与职业规划，助力其更好地成才与发展。例如：在高校低年级开展生涯规划课程，对低

年级学生进行有效的生涯启蒙,以及“核心能力培养”;对高年级开展专项就业指导工作,增强学生自身认知及其对政策与岗位的认知程度,减少盲目考研、考公现象。通过将就业实习向低年级拓展、加强家长教育等,尽早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并设立合理的期望值。

## (二) 就业主管部门应精准施策,结合不同“慢就业”群体特征精准投放就业政策

“慢就业”群体具有复杂性,具体体现为不同群体选择“慢就业”的原因各不相同,包括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经济条件允许其“慢就业”或不就业、工作岗位未满足其需求、致力于“二战”考公考研等。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慢就业”群体,就业主管部门应具体类型具体分析,将就业政策分类整理,精准吸引不同群体的目光,直击痛点展开帮扶,促进“慢就业”群体参与就业。在当前事件中,不乏精细化的“一对一”就业指导,但定点指导的覆盖面积较小,需要毕业生主动寻求,难以大规模展开。相比之下,分类实施不同类型的政策更能抓住关键要素,促进毕业生改变“慢就业”状态。

## (三) 相关部门应增强政策宣传力度和效度,抢抓关键期精准宣传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和高校在相关政策出台后和执行过程中,需建立“协同育人”机制,通过运用多种信息化技术,创新性地开展系列融媒体项目,利用公众号、抖音、微博等新媒体渠道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及时向毕业生讲解、介绍就业政策;可以创新政策宣传方式,激发毕业生对就业政策的兴趣。同时,应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面向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宣传和引导,让政策更广泛地惠及毕业生,提高就业政策在毕业生中的知晓率,帮助毕业生更好地理解就业政策并与其形成有效连接,提高政策的适配性,从而确保政策宣传能够抵达毕业生终端。

## (四) “政校联动”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就业指导活动

相关部门及高校要承担起就业指导工作,落实好就业政策。高校在人才培养之始就应该切实地关注到社会现实的需求,不断调整本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人才;同时,可以将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贯穿于高等教育全过程,设立相关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或者在专业课程及思政教育课程当中普及就业知识,让学生深刻了解自己应当掌握的基础技能和本领,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新要求。此外,高校可以利用好自身的资源优势,加强校企合作,联合社会各界为毕业生提供更全面、有效

的就业服务,如开展求职培训讲座、简历诊断、校园招聘会,以及提供个性化指导、设立业界导师等,增强毕业生对职场的了解,提高毕业生的求职能力,为学生顺利就业奠定更好的基础。

(五) 建构就业政策评估体系,及时调整政策输出行为

科学有效的就业政策评估体系有助于政府了解就业政策的整体质量、社会效益和影响,及时发现就业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为就业政策优化和调整就业政策提供依据,进而及时有效地根据政策反馈结果调整政策输出行为。人社部有关文件曾提及要“强化就业服务成效评估,研究建立公共就业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探索开展第三方评价”,但该评价体系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规范。针对就业政策评估,应重视就业政策评估体系的建构,根据政策目标选取多元适当的指标,如就业政策满意度、客体政策感知度等指标,全面掌握政策的效能、效益、效果、价值和公平性等方面,根据反馈结果及时调整政策输出行为。

## (六) 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有力支撑

在新经济形势下,涌现出许多新就业形态,有关部门应当给予相应的政策性扶持和优惠,根据行业动态出台更多的激励政策,调动相关行业吸纳毕业生的积极性,千方百计拓展市场性就业岗位,全力开发落实政策性就业岗位,以政策性岗位的吸纳作用稳住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盘”。建立健全相应的就业保障机制,维护好毕业生的合法权益,让毕业生满怀信心地投入新兴行业,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趋势。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 参考文献

- [1] 徐丽红. 顶格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大学生“慢就业”的应对之策[J]. 思想政治课研究, 2021(4): 83-92.
- [2] 林科吉. 浙江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分析与创新对策研究[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22(19): 16-22.
- [3] 宋健, 胡波, 朱斌辉. “慢就业”: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及教育的影响[J]. 青年探索, 2021(6): 25-34.
- [4] 杨玲玲. 精准就业服务视角下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探析[J].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21(6): 72-76.
- [5] 刘保中, 臧小森. 转型理论视域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心态与生活状态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9): 51-60+24.